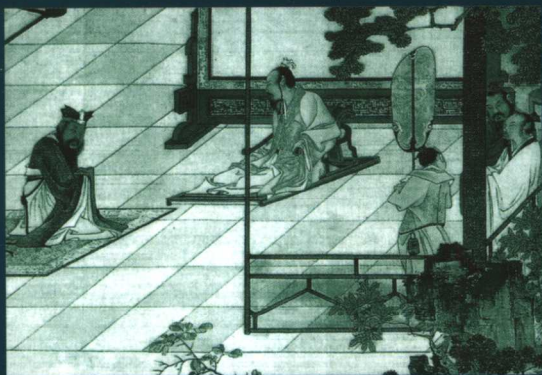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明代 史学探研

杨艳秋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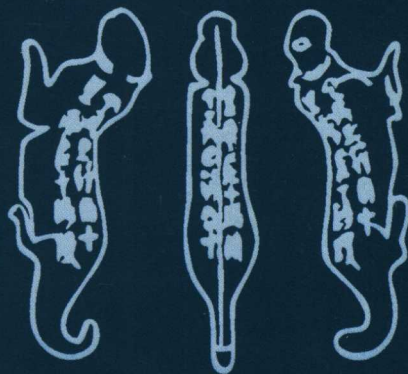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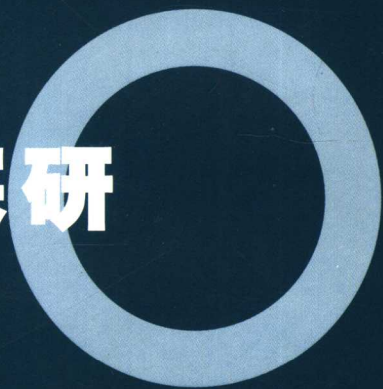
Mingdaishixuetanyan



人民出版社

杨艳秋 著

# 明代 史学探研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邵永忠

装帧设计：徐 晖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代史学探研/杨艳秋著. -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  
ISBN 7-01-005282-4

I. 明… II. 杨… III. 史学史-研究-中国-明代  
IV. K092. 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2311 号

### 明代史学探研

MINGDAI SHIXUE TANYAN

杨艳秋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1

字数: 280 千字 印数: 0001-3000 册

ISBN 7-01-005282-4 定价: 28.00 元

## 序

凡科学，皆有生命，史学亦然。史学的生命力何在？千百年来，历代史家递有讨论。在文字信息化的今天，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并读到这些史学家的评论，但却很难从中理出清晰的思路。

从科学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来看，科学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，从而支持人类精神的发展与延续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发现和发扬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精神，许许多多的史学家们也正在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。这种为人类精神持续发展而努力的执着追求，也是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所在。所以，我想，他们不应该躲进象牙塔去做所谓深奥的学问，而应该关注社会、关注现实。

反过来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也将督促他们饱含激情地研究人类文明的进程，记述民族精神的成长，预测未来的发展。在辉煌的盛世，他们发出忧虑深思的慨叹；在衰落的时候，他们穷极思路，寻求变革，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。众多的先哲已经用他们的思想实践了这一责任，天才的史学家卡莱尔也正是

做到了这一点，所以至今为我们所赞许。

科学的责任在于继往开来，研究前人的成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、展望人类的未来。在前人的著作中，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简单的文字，而应当透过这些文字，发现其中的思想和精神，那是史学家们对前人、当代和未来的理解与预言，是他们对民族文化与历史进程的诠释，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和向往。

史学既有时代的烙印，也有史家的激情与理想，只有站在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，才能真正理解与创作辉煌的史学。因此，我想，一部好的史学著作，应当建立于开阔的视野之上，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繁多的细节，刻意赋予它们一种固化的思维理论，用假想的结论去寻找众多的论据。在教条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模式下，常常是没有研究就已经出现结果，或陷入狭隘的文字辩论，从而失去思想的源泉，远离了人类精神的历程。史学著作不应仅仅成为只有学者才能读懂的工具书，而应当更多地启迪人们的智慧，呼唤人类的精神。

历史研究是片断的，而史学家的思想应该是完整的。不论朝代长短，人类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其间。在片断的历史研究著作中，这些鲜活的思想，应当得到完整的展现。

这是我对史学研究的一些粗浅看法，《明代史学探研》一书出版在即，谨以为序。

卞长军

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

## 引 言

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，明代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未能受到重视，这是当今史学界所公认的一个问题。而且明代史学不发达，不如宋代和清代，这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。观念的形成，不是一朝一夕之故，我们需要探究它的历史渊源并进行客观的分析。

### —

俯瞰整个明代史学的发展，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，从明清学者的言论中，几乎找不到对明代史学的佳评，而且批评之激烈，似乎对之深恶痛绝。正确客观地认识明清学者对明代史学的评价，对我们研究明代史学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。

明代学者对本朝史学的否定，明确地表现出批评官修《实录》和私修野史两种倾向，其中，文史大家王世贞<sup>①</sup>的评论最具代表性。他从修史制度的缺憾和记载失实两个方面坦言明代《实录》不可信。认为：“纂修实录，六科取故奏，部院咨陈牒而已，其于左、右史记言动，阙如也！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；国忸袞阙，则有避而不敢书；而其甚者，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，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，即书故无当也。”指出：“国史之失职，

未有甚于我朝者也。”他还列举了野史“挟岁而多诬”、“轻听而多舛”、“好怪而多诞”的三种弊端。<sup>②</sup>在这位文坛领袖的影响下，李维桢<sup>③</sup>、谢肇淛<sup>④</sup>、焦竑、李建泰等明代学者也对本朝史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，在他们毫不容情的笔下，明代史学似乎已一无是处<sup>⑤</sup>。

在考察明人对本朝史学的评价时，我们还会发现，明代遗民的批评尤为激烈，如谈迁认为，明代的野史“见闻或失之臆，体裁或失之偏，记载或失之略，如阙椽焉”<sup>⑥</sup>。张岱则在其《石匱书》中大发感慨：“第见有明一代，国史失诬，家史失谏，野史失臆，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。”<sup>⑦</sup>万斯同更是对明代的野史——点名批评，认为明代影响较大、最具代表性的野史著作，不是“事迹颇失之略”，就是“褒贬间失之诬”，“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”。他惟一称道的史书是焦竑的《国朝献征录》，也不过只是“可备国史之采择”而已，总之，“诸家史书牴牾疏漏，无一足满人意者。”<sup>⑧</sup>

清人对明代史学的看法主要体现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明显地带有贬低意味。如一提到明代的野史杂记，就是“明人恣纵之习，多涉疏舛”；“明人学无根柢，而最好著书，尤好作私史。其以累朝人物汇集成编者，如雷礼之《列卿记》、杨豫孙之《名臣琬琰录》、焦竑之《国朝献征录》，卷帙最为浩博，而冗杂泛滥，不免多所牴牾”<sup>⑨</sup>。对于明代的史论著作，则誉议更大：“明代史论至多，大抵徒侈游谈，务翻旧案，不能核其始终。”<sup>⑩</sup>

明清两代学者对本朝和前代史学的贬低无疑已到了一种偏激的地步，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后人对明代史学的评价，那么，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？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也许对发现问

题的症结有所帮助：

第一，官方史学观念的束缚。自唐代史馆确立，官修正史的地位就已经深入人心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今总括群书，分十五类。首曰正史，大纲也。……今并从官本校录，凡未经宸断者，则悉不滥登，盖正史体尊，与经义配，非悬诸令典，莫敢私增，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。”“经宸断”、“与经义配”，正史在史书中的崇高地位可以想见。在这种史学传统之下，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国史和官史。明代学者关于“本朝无史”，“迄今史无成文”的说法，指的都是国史的缺憾。明代的官修正史是一部《元史》，而《元史》的繁芜与粗略为世所公认，导致不断被改编；明代不修国史，以《实录》为国史，《实录》的纂修又往往和任情褒贬、记录不实相连，这当然会令人大失所望。野史大盛，国史不彰，对明代学者而言，是难以接受的现实。

第二，明遗民对明代史学不遗余力的批评，我们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，进行具体分析。首先，我们应该看到，他们在国破家亡的创巨痛深之际来检讨本朝学术，史学作为明代学术的一个方面，很容易也成为他们贬斥的一个方面。其次，我们发现，这些遗民本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明朝史的编写，张岱《石匮书》“五易其稿，九正其讹”；潘耒编纂《明史记》，怀铅握槊，终日矻矻，手不停书；谈迁撰写《国榷》，“冰毫汗玺”，稿窃而复写；万斯同助修《明史》，不列衔，不授俸，布衣入史局。那么，他们的这些批评也很容易被人理解，在这些批评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：他们要为自己重撰明史提供理论依据。

第三，清代学者对明代史学的批评也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，明清易代，批评胜国史学成为批评明代文化的一个方面。而且清人厌恶明代的学风，认为明人游谈无根而误国，这又直接影



响到他们对明代史评著作的贬抑，“凿空生义”、“荒谬不经”等言语遂直指明代的史论著作。我们还应该看到，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之际，正是重文献、重考证、重辨伪订讹、重广征博引的考据学盛行之时，清代学者以考据学家的眼光来衡量明代的野史，自然是谬误百出。而且，我们也应该看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的评论也并非处处公允，有的还带有感情色彩，不能视为定论。<sup>⑩</sup>

第四，评价当代史书之难。实际上，明代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如张萱<sup>⑪</sup>认为：“夫史难言矣，古之为史者数十家。班固、范曄，当时一以为浅陋，一以为佻巧。自汉而下，有不裨官晋、齐，诸六代，期期《唐书》，芜《宋史》而夷秽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三氏者乎？……左氏与龙门称良史焉，乃范宁谓左富而艳，其失也诬。王通谓史之失自迁始，曰记烦而志寡。噫！二史尤不免于腹诽，则言史于今，尤难之难矣。”<sup>⑫</sup>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这三部一般为人所称道的“前三史”在当时尚被挑出缺点加以贬抑，明人对当代史书的指责则更不待言。

另外，在两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宋代《资治通鉴》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分别成为纪传体、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典范的情况下，评价后出的明代的史书，很难再突破这种认识。

由上述原因，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明清两代学者虽然对明代史学多方批评，却并不就此意味着整个明代史学落后于其他朝代。我们应当用整体的眼光，多方面、多角度地衡量并审视明代的史学。而这一点，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明代史学史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，确如施丁先生所言，“有的冷得结了‘冰’，无人去探索，因而影响了古今史学史之‘通’；有的环节上脱了节，岂能通得起来。”<sup>⑬</sup>

## 二

20 世纪初,明代史学的研究即已发端。1931 年,谢国桢先生开始编纂《晚明史籍考》,搜罗晚明史籍,进行解题。1932 年,李晋华先生的《明代敕撰书考》出版,其中考察了明代 200 余部官修史籍。有关《明实录》版本和纂修状况的研究也逐渐展开<sup>⑤</sup>,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吴晗先生的《记〈明实录〉》,对明十三朝《实录》进行了综合评述。此外,朱希祖《明季史籍五种跋文》<sup>⑥</sup>、缪凤林《明人著与日本有关史籍提要》<sup>⑦</sup>、吴玉年《明代倭寇史籍志目》<sup>⑧</sup>、薛澄清、容肇祖对张燮及其域外史著作《东西洋考》的研究<sup>⑨</sup>,等等,实已开明代史学研究的先河。

然而,若将明代史学的研究状况置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整体发展中,就会发现,学界对此还是缺乏应有的关注。

在通行的史学史著作中,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当时学界对明代史学的认识。具体来看这些史学史著作,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史学史著作,如魏应麒《中国史学史》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、刘节《中国史学史稿》、李宗侗《中国史学史》、高国抗《中国史学史发展概要》<sup>⑩</sup>等,其中关于明代史学部分,或是一笔带过,或是浅论而止,不过二至数页而已。主要集中在叙述纂修《元史》、《明实录》、《明会典》等官方史学活动,对明代史学的评价,又多是引用王世贞有关明代国史失诬,家史、野史多妄的言论,由此得出“总的说来,明代的史学成就远远比不上宋代”,“明人之史才终不若宋人也。以数量言之,则两代相近,以质言之,则明远不能上比于宋也”<sup>⑪</sup>的结论。台湾学者吴智和在论及明代史学时说:“国人所著史学史在通论明代史部分,所述多失之浮泛粗略,不然就是厚诬明人。”<sup>⑫</sup>此论或

有所偏颇，但是这些史学史著作中对明代史学论述的“浮泛粗略”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在肖黎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学四十年：1949～1989》中，施丁先生分历史阶段统计了1949年到1988年上半年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情况，其中，涉及明代史学的论文有66篇，占论文总数的2.2%，居于末位；论著6种，占著作总数的3%，也是倒数第一。这使得作者不得不为之叹息：“明代历时近三百年，史家史籍很多，但有关明代史学史的论著太少了。”<sup>②</sup>乔治忠教授《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》概述了学界1987年以前先秦至近代（1840～1949）史学史的研究状况，也指出：“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史学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。”<sup>③</sup>可见，直至80年代末，明代史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。

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是黄彰健对《明实录》版本的考证、包遵彭对王世贞史学的研究、赵令扬对李贽史学的研究。<sup>④</sup>

相对于国内研究的清冷，国外明代史学研究的开展较为引人注目。日本学者很早就开始对《明实录》的版本及与之相关的起居注制度进行考察，今西春秋《明代起居注研究》、潜野忠允《明实录杂考》、间野潜龙《皇明实录私考》<sup>⑤</sup>等皆属此类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间野潜龙对祝允明进行研究，撰写了《祝允明的史学》<sup>⑥</sup>一文。藤虎次郎的《支那史学史》<sup>⑦</sup>著于1969年，内分“元史”的编纂、“大规模的编纂作品”、“掌故学之一变”、“李贽之史论”、“杨慎之学”、“归有光的史记评点”、“胡应麟的笔丛”、“正统论”、“王光鲁的沿革地图”、“焦竑的目录学”、“金石学”、“经世文的汇编”、“类书”13节，从史学、史料、史论、考证、历史地理、书目、类书等方面总体地评价了明代的史

学，对明代的野史掌故持赞扬态度，至今仍对我们启益良深。德国学者傅吾康亦很早就开始探讨明代史学，他的《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》<sup>②</sup>对整部《明实录》作了系统的考察，《明代史籍汇考》<sup>③</sup>撰成于1968年，是一部全面评价明代史学的著述。

### 三

反思也是随之而来的。早在20世纪60年代，谢国桢先生就在《明末清初的学风》一书中指出：“拿清代考据学家的尺度来衡量明代的学风，明代的学术思想自然是有时过于疏略；可是拿明代学术思想的放达和记载朝野逸事的丰富来比较衡量，清代考据学的末流荒无故实、不关痛痒的繁琐考证，那不更显得索然寡味吗？”<sup>④</sup>他在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余尝以为，有明一代，史学最盛，若焦竑之《献征录》、王世贞之《四部稿》、何乔远之《名山藏》、郑晓之《吾学编》，恢弘典则，蔚为巨观。”<sup>⑤</sup>朱仲玉先生也认为：“历来中国史学史著作，对明代史学或简单地一笔带过，或认为明代有史书而无史学，史学在明代是一个空白点，这恐怕不大公平。”<sup>⑥</sup>

学者们开始分析明代史学不为人关注的原因：施丁先生指出：“因明代史学史缺少名家名著，故研究这方面的论著就少得可怜。”“有的学者鉴于此，决心对此薄弱环节加强研究，写出专著。”<sup>⑦</sup>台湾学者吴智和先生认为，明代史学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冷落，一是因为注意的人太少，二是受到一些陈言旧说的影响，三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家强烈地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。他说：“明代史家何其多，著述也一向称盛，只因无人注意之，加以陈言旧说，偏见诬蔑，牢固人心，咸指目明人无学，史学荒芜。……明人的史学的成就，仍然有它一定的贡献，只是并不显得特别地

突出。明末清初的一些闪耀的大家,强烈地吸引学术界人士的注意力,因此,相对地,明代三百年间的史学,就显得黯淡无光。有此结果,其原因固然很多,无人研究并提出成果,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”<sup>⑤</sup>“无人研究并提出成果”,这是令人深思的一句话。

但是我们也应看到,对重新认识明代史学,学者们已经作了一定的努力。董朴垞发表在《史学史研究》1980年第1期上的《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》中,第七编《元明史学》对明代史学的规划非常详细,拟写十一章,涉及到官修《元史》、《实录》、《会典》,国史编纂,目录校讎,补续通鉴、纪事本末、三通,改编陈志,改编宋史,而且对明代私修当代史单列出“喜谈本朝掌故”一章。共设细目40个,包含史籍36部。<sup>⑥</sup>

转折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,在对史家和史著进行考察时,涉及明代史学的文章渐渐增多,除却李贽、王世贞、谈迁等明代史家,《国榷》、《史纲评要》等较受重视的明代史著外,台湾学者吴智和对明代朱国祯、谢肇淛、何良俊等人的史学作了专题研究。<sup>⑦</sup>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还对焦竑、丘浚的史学进行了探讨。<sup>⑧</sup>大陆的明代史学史研究应当首推钱茂伟先生,他对朱国祯《皇明史概》、陈建《皇明通纪》、郑晓《吾学编》、吴士奇《皇明副书》、许重熙《嘉靖以来注略》等都有专文研究。

综合性的研究仍然较为少见。只有姜胜利的《明代野史述要》、葛兆光的《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》<sup>⑨</sup>等少数几篇论文。但这两篇论文的分量却非常沉重,前者是最早总体评述明代野史和私家修史的专题文章,实开此后明代野史研究的先河。后者对明代嘉靖、万历时期出现的维护史学客观性、严肃性的思潮和反传统的思想潮流,以及万历末年出现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,对研究明代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在史学史专著中,我们发现,有关明代史学的内容正渐渐得到充实,尹达的《中国史学发展史》第三编第五章《宋明间的史论与史考》,仓修良、魏得良的《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》第四编第二章《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》,陶懋炳《中国古代史学史略》第五编第一章《明代的史学》<sup>④</sup>等对明代史学都所涉较多,但总的来看,仍然是缺乏总体全面的论述。掩卷而思,不免会有些遗憾。

#### 四

近十年来,明代史学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关注,进入了发展与繁荣期。在论文的撰写上,有关王世贞、陈建、李贽、焦竑、胡应麟等史学家,有关《明实录》、《万历起居注》、《明会典》、《通纪》、《续藏书》等史学著述的研究起而不衰<sup>⑤</sup>,与此同时,许多论文开始脱离开史家、史著囿限,多角度、多方位地展开论述。

其一,综合、整体性的研究不断推出。赵令扬《论明代之史学》、李小树的《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——明代史学探论》<sup>⑥</sup>,钱茂伟《明代前期史学初探》、《论晚明当代史的编撰》、《明中叶史学的转型》等<sup>⑦</sup>,都是考察明代史学的通论性文章。

其二,开始关注制度之探索。商惠明《明代史馆考述》、谢贵安《明代史馆探微》<sup>⑧</sup>等文章考察了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和管理制度,对它的内部结构和机构性质进行了考订。

其三,开始探讨明代史学的时代特色。瞿林东的《明代的经济史研究》<sup>⑨</sup>、向燕南《论明代经济史撰述的突出发展》<sup>⑩</sup>、《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》<sup>⑪</sup>等,探讨了明代史学上的重要现

象，是探讨明代史学时代特点的论文，将明代史书编写的史学特点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。

其四，新领域的开拓。朱仲玉的《明代浙东史学述论》、姜胜利《明人整理当代史史料述论》、牛建强《明代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考述》、乔治忠《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》<sup>⑧</sup>，台湾东吴大学黄兆强《明人元史学探研》、《明人元史学编年研究》等<sup>⑨</sup>，都是视角新颖的论文。

这些既是明代史学研究的突破，也说明对明代的史学进行综合整体研究的工作已经被提上了日程。而重新评价明代史学的呼声也开始响起，向燕南教授在《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，有必要重新评价明代的史学。”<sup>⑩</sup>台湾静宜大学廖瑞铭教授撰写了《明代史学的再评价》一文，认为：“我们有理由站在更宽广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明代史学成就，给予适当的评价，并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找到它的定位。”<sup>⑪</sup>

近几年以来，相关专著，如李文淇《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》、高春绶《黄佐生平及其史学》、谢贵安《明实录研究》、李小林《万历朝官修正史研究》、任冠文《李贽史学思想研究》，<sup>⑫</sup>等等，不断推出。更为可喜的是，有关明代史学的整体研究，也出现了两大特点：

特点之一是综合性专著的出现。2000年，吴怀祺主编、向燕南撰写的《中国史学思想史·明代卷》由黄山书社出版，分上、下两编对明代前期（洪武迄正德）和后期（正德以后）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考察，向我们展现了明代史学思想的全景，揭示了明代史学思想的特征及主要走向。2003年1月，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傅玉章、傅正的《明清史学史》。2003年5月，钱茂

伟《明代史学的历程》被收入东方文库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作者二十年来成果的积累，全书依照理学笼罩下的史学（明代前期）、中国史学的转型（明代中期）、中国史学的多元化（明末清初）三个阶段，推演了明代史学发展的进程，并总结了明代史学的成就及历史地位。

特点之二是明代史学在史学史著作中受到了重视。在近年出版的史学史专著中，以往忽视明代史学的状况为之一改，1999年，瞿林东《中国史学史纲》中，有关明代史学部分叙述得非常详尽，其章节设置也突出了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。<sup>③</sup>2000年，白寿彝主编的《中国史学史校本》第五章“明清时期”由施丁、顾诚共同执笔，除评介明代官修史籍外，还以人物为中心，对郑晓、王世贞、李贽、焦竑、茅元仪、陈子龙、何乔远、陈仁锡、王圻、张萱、朱国祯等十余位明中后期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考察。

而1999年杨翼骧先生《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》第三册（元、明卷）和2000年钱茂伟《明代史学编年考》的相继推出，也为明代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便利，嘉惠学林，功不可没。

## 五

2000年，我在以《明代史学探研》为题，撰写博士论文时，复旦大学的钱茂伟、北京师范大学的向燕南两位学者均以明代史学为选题，与我同时而作。而今，研究的推进和成果的涌现，使得综合深入研究明代史学的条件更为成熟。当脱开从某个史家、某部史著来苛责明代史学的观念，将明代的史学置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中时，我们会发现，研究的空间，竟是如此的开阔。以下几个方面是明代史学研究中应当注意和可以继续探讨



的问题。

1. 明私修当代史之盛是明代史学上，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关于对明当代史撰述的研究，当今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但是仍乏系统的考察，明代私修当代史勃兴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？应当怎样来全面认识明代的私修当代史？应当怎样把握明代独特的史学现象与时代之间的关系？都待继续探索。

2. 在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方面，人们时常从唐代刘知幾的《史通》谈到清代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而在中间隔越了宋、元、明三朝。从而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，一种思想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都应当是渐进而连续的，在从《史通》到《文史通义》的过程中，应当会有一些踪迹可寻。明代中后期的史学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：《史通》一书的发现和推广恰恰是在明代中后期，而且从明代中后期开始，明人文章中有关史学的论述异常丰富，虽然没有形成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这样的专著，但是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建树，这是应当值得重视的问题。

3. 从史学思想、史学思潮上看，明代是一个基本上被忽略的朝代，学界甚少论及，即使有所涉及，也是关于个别人物，主要是王世贞、李贽等人的史学见解。更以对明末清初的顾（炎武）、黄（宗羲）、王（夫之）三位大家进行评介的居多，将他们的历史观作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明代史学思想的认识将是片面和不完整的。

4. 明代史学上的许多现象，如明代经世文论的汇编、明代的通史、明代的典章制度史、明代的乡贤传记、明代的军事史著等等，都是今日史学界分析较少的史学问题，有进行研究的必